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在强调中华文化的重要性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写道，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当时古代希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等文明都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文化传统，并一直影响着人类生活。这段话讲得很深刻，很有洞察力。”

雅斯贝尔斯（1883—1969年）是德国人，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存在主义哲学代表人物，在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多个领域都有重要建树。雅斯贝尔斯一生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是反思之作，也是他的历史哲学代表作。他认为，“唯有整个人类历史能够提供当下所发生的一切的意义的尺度”。《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试图从整体上把握人类历史的本质，探索人类发展的奥秘。书中的“轴心时代”的命题产生了巨大反响，引发了长期、广泛的讨论。

雅斯贝尔斯把以往的人类发展史分为四个阶段：即史前时代、古代高度文化时代、轴心时代和科技时代。

在史前时代，人类学会了使用火和工具，产生了语言。在古代高度文化时代，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和中国黄河流域产生了古代的高度文明。

轴心时代是人类意识的觉醒时代。在这个时代，人意识到自己能力的限度，意识到自己作为整体的存在，开始追求更高的目标。雅斯贝尔斯指出，存在一些轴心民族，包括：中国人、印度人和希腊人等，这些民族在轴心时代实现了新的飞跃，奠定了人的

精神本质及其真正的人类历史的基础。令人惊异的是：这一飞跃是在上述民族中相互独立地发生的。

轴心时代之后，世界历史进入了科学技术时代。16世纪开始，人类社会发生巨大变化，“过去几千年来习得的劳动方式、生活形式、思维方式和象征物荡然无存”；全球通过交流成为一体，历史第一次成为了世界历史。在这个时代，西方文明以技术进步为基础，主导世界的发展进程。雅斯贝尔斯肯定了这个时候的巨大进步，同时对西方社会的发展方向心存不安，因此追求建立具有“统摄”力的世界哲学。

雅斯贝尔斯特别强调轴心时代的意义，他把轴心时代称作突破期，把另外三个历史时期统称为“间歇期”。间歇期为轴心时代的突破集聚必要的能量，进一步发展轴心时代取得的成就。“突破期”为人类以后的发展奠定基础、树立标准。在科学技术时代这个间歇期后，人类能迎来新的轴心时代吗？

雅斯贝尔斯一度热衷于政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积极投身各种政治活动，揭露资本主义世界垄断统治和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轴心时代”体现出的“深刻”与“洞察”，是基于他的社会实践和长时间的哲学思考，他是用轴心时代的概念批判二战期间轴心国的倒行逆施。

轴心时代的理论体现了人本主义。它破除了基督教信仰缔造的历史哲学神话。轴心时代是“没有某一特定的信仰内涵的尺度”，是“获得全人类的、超越所有信仰之上的共同的东西”，它不是基于个别信仰的启示，而是基于人人都可以理解的经验。

轴心时代的理论是对西方中心论的否定。西方中心论认为西方文化优于非西方文化。黑格尔就主张，历史循着从低级到高级的线性发展，西方处于这一发展的高级阶

段。东方文化是没有历史的，缺乏理性的。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正是西方国家发起的吗？这不证明西方社会出问题了吗？

雅斯贝尔斯认为，西方在东方面前没有理由傲慢，“欧洲人的自我满足感”可能导致了他们把“异域的世界仅仅当作怪物来看待”。他肯定欧洲在轴心时代和科学技术时代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并不认为西方文明是人类唯一的出路。他追求建立具有“统摄”力的世界哲学，并特意指出，通过对中国文化的摄取，可以促进欧洲的自我反省能力。

轴心时代概念的提出和建立世界哲学的期许体现出雅斯贝尔斯深刻的人文关怀和远见卓识。雅斯贝尔斯追求的理想社会包含更多非西方国家的文明贡献，更具有“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人类文明”的特征。在这样的社会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源泉”，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大变局不仅涉及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包括文明的演进，包括弥补和克服西方文化的缺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具备这些根本特征的中华文明将“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对话交流的前景，让人们对新轴心时代出现的可能和样式充满期待。

先秦文化：中华文化融合发展的原始基因

□ 陈 煜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文明就已经摆脱了野蛮蒙昧的状态，进入了先进发达之境。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由多元走向一体，并且在一体的基础上保留精彩纷呈的多元形态的最重要的时期，恰恰就是先秦。至战国末期，遂形成齐鲁、三晋、越楚这三大核心文化圈，它们齐头并进，彼此交融，最终形塑了灿烂的中华文化。故我们说先秦文化，其潜德幽光，乃大兴于后世。

先秦文化蕴藏着中华文化的原始基因。先秦时期创造的灿烂文化，无论是在思想传承上还是在社会实践上，都给后世留下了可资借鉴和利用的资源，且能常用常新。而且，先秦文化具有十分强烈的超越色彩，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如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黄宗羲就论道：“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三代”固属先秦，但黄宗羲论述的目的，并非讨论先秦之法，而是用“作为方法的前秦”，来构建他心中理想的法制。与此相类，中国历史上许多“托古改制”者，其理论依据，亦大多来自先秦特别是“三代”。可见，先秦已经超越“历史”范畴，而进入到一种民族文化心理之域。

我们可以说，中国思想文化核心精神，基本都奠定于先秦之时，举起要者又有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礼教中心。中国一向被视为“礼仪之邦”，最重礼教。礼的发达也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标志。先秦时期，时人对礼的认识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如公元前517年，郑国的子大叔与晋国执政赵简子论礼时谈到：“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礼被视为立国和成人之本，应该已经成为当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准则。

其次，义务本位。无论是礼还是由其派生出来的刑，都要求人们承担一定的义务或责任，先秦典籍中对此说得也非常明白：“土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义于民秉彝。”当然这个义务或责任，既是法律上的，更是广义的道义上的。义务本位，就是中国文化中，十分强调个人对他人及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这个义务本位的最高体现。

再次，家族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信奉家国一体，国乃家的放大。社会生活以家族为基本单位，故对于破坏家族和谐的行为，甚至不惜以严厉的刑法来惩治。比如后世法典就规定“不孝”为十恶不赦的重罪。而这个观念同样自先秦即启其端，如《尚书》云：“王曰：封，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将属于家族伦理的“不孝不友”，视为治国理政的极则，充分说明了家族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意义。

最后，民本对待。中国文化强调民本，有两层含义，第一是远亲近人，历来治国理政者视人民的福祉为重，而不乞灵于超现实的神祇；第二，也是最为突出的，则是将人民视为国家的财富、立国之本根。《尚书》“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一语，可视为传统民本思想的最强音。立足于现实人生，崇尚人文关怀。

以上四者，不过略举大端，但它们已经深深渗透到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当中，至今不绝。而这些思想，都是发端或者成型于先秦之时。因此我们可以说，发达的先秦文化，蕴藏着中华文化的“基因密码”，要想理解中华文化，必得上溯到先秦。

先秦文化奠定了中华文化区系“条块”融合的基础。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了中国考古学文化的“条块说”，将全国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分别为以燕山南北长城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它们共同构成了整个中华文化圈，而在各自的区系中，又有核心文化区和边缘文化区。

不同的生态环境，不同的内容的生产活动，不同的文化传统，这是形成不同文化区系的根本原因。而每个文化区系自身发展所形成的文化特征决定了每个文化的性质。不同文化

《诗经·召南》中《甘棠》诗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这首诗的意思是，甘棠树茂密又高大，不要剪它别砍它，召伯曾在这儿露宿过；甘棠树茂密又高大，不要剪它别毁它，召伯曾在这儿休息过；甘棠树茂密又高大，不要剪它别拔它，召伯曾在这儿停留过。显然，这是首怀念召伯的诗。那么，诗中一咏三叹所颂召伯是谁呢？

召伯也称召公，姓姬名奭，周文王庶子，周武王之弟，曾辅助周武王灭商，被封于燕，因其最初采邑在召（今陕西岐山县西南），故称召公。

召公在官方典籍中记录很少，但在西周历史上却是一位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他作为西周重要的辅政大臣，历经武、成、康三朝，被称为“三朝重臣”，为“四十年刑措不用”的“成康之治”立下汗马功劳，对于建立并巩固西周政权，起到重要作用。

周文王时，召公就已崭露头角，显示出卓越的政治才能。在文王谋划兴周大计之初，召公不畏艰险，远涉南方诸国（分布在江汉流域各诸侯国）宣扬文王的德政，揭露商纣的暴行，争取人心，结交盟国，扩大周在南方诸国的影响。南宋大儒朱熹对这件事曾有评价：“（文王）且使周公为政于国中，而召公宣布于诸侯，于是德化大成于内。而南方诸侯之国，江汉汝汉之间，莫不从化。盖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

周武王时，召公跟随武王参加讨伐商纣的牧野之战，周联军以少胜多，商纣大败。牧野之战后，周公旦手持大钺，召公奭手持小钺，左右夹辅周武王进入朝歌举行祭社大礼，宣告周朝建立。庆功典礼上，“召公奭赞采”，即奉币主持庆典活动。《诗经·大雅·召旻》追忆此事时写道：“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由此可见召公在西周王朝建立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武王克商三年后病逝，儿子姬诵继位，即周成王。成王年幼，叔父周公代行行政事，召公任太保，位列三公，是重要的辅政大臣。周、召二公分陕而治（古陕县，今河南三门峡市），陕以东由周公管理，陕以西归召公管辖。召公负责开发黄河中游地区的农业生产，建立巩固经济后方，为周公东征提供经济保障，同时协助成王处理政务，行礼乐、施教化、卫戍王室，协调诸侯关系。召公以德治国，勤政爱民，他经常下乡巡视，体察民情，甘棠遗爱的事迹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召公为官清廉。他外出巡视时总是轻车简从、粗茶淡饭，拒绝当地官吏的盛情款待，拒绝朝廷给他提供办公场所，而是在田间地头处理民间事务，了解百姓疾苦，工作累了就在田间地头歇息。

一天，召公来到岐山脚下一个小村庄，村民纷纷前来请求召公解决纠纷。此时正值盛夏，天气炎热，召公看到路边有一棵郁郁葱葱的甘棠树，树盖如伞，绿树成荫，于是就在此树下办公，听讼决狱，调解纠纷，忙碌了一天，待处理完最后一个案子，太阳已经落山。



□ 陈力

为了不打扰百姓，召公就在这棵甘棠树下搭一草棚住下。地方官吏认为这样太过简陋，要让村子里的百姓腾出房屋供他歇息，召公马上制止，说：“不劳（我）一身，而劳百姓，不是仁政。”这样，召公就在甘棠树下的草棚里过夜休息，饿了就摘食树上的棠梨果子，棠梨甘甜多汁，既解渴又解饿，召公非常喜欢。召公告诫地方官吏一定要保护好这棵甘棠树，这棵树枝繁叶茂，可以为过路歇息的百姓提供荫凉，棠梨果实验甘甜可口，可以为劳作的百姓解渴充饥。百姓听闻召公所为，大为感动，盛赞召公体恤民情，于是就把召公甘棠听政的故事编成歌谣传唱，后收入《诗经·召南》，传诵至今。

风雨沧桑，当年那棵郁郁葱葱的甘棠树今已不在。但召公甘棠听政已固化为一种勤政爱民、廉洁从政的精神，甘棠遗爱也作为一个典故流传下来，用来颂扬被百姓念念不忘的好官。



足辨。孟子就直截了当地指出：“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可见先进文化取代后进文化，已经是一种不可逆的趋势。先秦儒墨道法诸家，皆是有理论有担当的思想体系，对自然与社会、人生和人心都进行了体系化的思索，无一例外皆博大精深。代表着“华夏”文化的精华，皆是先秦文化关于礼义、责任、家族、百姓诸核心命题的进一步深化。其面临的社会情势和要解决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社会该如何治理，人心该如何安放才至妥帖。只是在不同的文化圈内，各自的侧重点或者方法论不一样。齐鲁文化圈，主要就主张通过礼义教化实现治理；三晋文化圈，主要就主张通过政刑法制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至于荆楚文化圈，既不主张礼义教化，又不主张政刑法制，而采取一种相对消极的“与民自化”的措施，实现社会的自然进化，也都促使这三大文化圈各自向四周扩张其影响力。

以夏变夷，固然是一个先进文化影响后进文化的过程，同时也可视为同等程度文化相互吸收借鉴的过程。这个过程，就体现了文化的融合。事实上，以上三大文化圈任意一个，皆不是单一纯粹的文化圈，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合交流从未间断。诚如严耕望先生所云：“儒、墨、道、兵各即其地位中心向外传播，墨学西北传入三晋，影响名家之兴起，南传而为别墨，亦与名家为近。儒、道西传三晋，助成法家之兴盛；东传至齐，道衍为黄老，儒则颇与阴阳合流……”法家在未能吸收儒、道精华之前，可目之为“夷”，儒、道西传三晋，则可视之为“夏变夷”，最终使得法家学术更上层楼，充分体现了文化圈或者文明的融合。

总之，如苏秉琦先生所云：“到战国末世，夷夏共同体重组的历史使命已大体完成，由此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社会基础。”三大文化圈的形成与融合，亦可视为夷夏共同体重组的大体完成，这得拜以讲求礼义、倡导责任、注重家族、强调民本为主要特征的先秦文化所赐。

